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中共在歷經毛澤東到鄧小平的政權中，領導人的政治—戰略和經濟—戰略取向，均會影響其外交政策。¹毛澤東到鄧小平時期的最大區別，就是將重點由「繼續革命」²轉向「現代化」，這造成重點置於第三世界國家交往的「小國外交」，轉變到與經濟實力堅強的資本主義國家實施的「大國外交」的開端³。

毛澤東時期的世界戰略係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聯合亞、非其他落後之第三世界諸小國與其他大國分庭抗禮，進而名列世界舉足輕重的角色。⁴到了鄧小平時期卻是極力的希望世界提供一個和平的環境，給予國內經濟建設的發展；進而，進入更廣泛的國際社會，與更多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以及被認為是一個「準超級大國」⁵。中共是否已轉變其外交政策來迎合國家利益的發展，是筆者希望探究的問題。

中共的對外政策，早在 1954 年，當時的總理周恩來與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共同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大舉反霸權主義的大纛，以集結不結盟國家和擔任第三世界一份子的角色自處，⁶這也是中共外交政策的官方基礎。

然而，這並無法讓中國大陸有著更平穩的國內環境，以及國際地位，因為毛澤東領

¹趙全勝，**解讀中共外交政策微觀—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台北市：月旦出版社，1999 年），頁 95。「毛澤東時期的這些政治—戰略考慮常常使中國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黯然失色，特別是中國的對外經濟關係」。

²趙全勝，前揭書，頁 96-97。

³趙全勝，前揭書，頁 98。「中國領導人此時相信應當強調經濟現代化而不是意識型態。……它需要同那些有能力幫助中國實現經濟現代化目標的資本主義國家有更大的交往。」

⁴趙全勝，前揭書，頁 103。「1965 年，中共國防部長林彪詳細闡述了北京的世界戰略。林彪(1965)認為中國共產黨人民戰爭的戰略—在農村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然後包圍都市，同樣可以適用於世界革命：歐洲與北美是城市，第三世界是農村。這樣，世界革命的成功將取決於以構成世界人口絕大部分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鬥爭。……中國對第三世界鬥爭給予了積極的支持，並且明顯放棄了五〇年代『一邊倒』的政策，積極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

⁵趙全勝，前揭書，頁 108。「哈里·哈丁(1988：12)所指出『北京已確保了所有主要國家的正式承認，它佔據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被視為東亞地區的大國，並被一些分析家看作是一個『準超級大國』，……」

⁶夏德富，**不結盟國家政府首腦宣言**（不結盟運動主要文件集：北京，1987 年），頁 19。中共在理論上是以集結不結盟國家之間的共通點，（只有在這種對抗導向一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統治的各種表現形式都被根本消除的世界之後，持久的和平才能實現）。

導下的中共，其外交政策主在確保在東亞地區的政治影響力及軍事影響力，⁷很難不讓周邊以及世界各國對其提升戒心。

自鄧小平主政後，他認為和平與發展是世界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以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干擾和平的是霸權主義⁸，為了能同這些資本主義國家有更大的交往，中共的立場是採取和平共處的原則。在民族自信心驅使及為獲得世界上各國更大資助的希望下，加強與發達國家的交往，並使本身具備大國的條件，以擠身大國之林。雖然建國思想與西方大國之資本主義有著南轅北轍的情況，但以大國利益互惠互補的「相融性」來說，以其之長，補己之短，期以獲得最大的國家利益。⁹就軍事同盟之本質來說，容易成為干涉他國政權主導性的工具。因此，中國為避免此類議題在第三世界中引起非議，以持續和平共處五原則、獨立自主的外交，以維繫中共的大國外交與共產黨利益的立場併行不悖。

在中共以此種採取與大國交往的思維下，與國際間的互動將不同於 1979 年以前。中國之「大國」戰略的意識反映在「十四大報告」裡，其鋪陳出來的全球戰略是：提出「綜合國力競爭戰略」、加入「國際體制」的賽局來「反霸」、以軍事保障國家權益等三大項。「多極化」在 1997 年之「十五大」後被理解成國際政治經濟力量的重組與大國間關係的調整。根據「三個世界」理論而來的「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國家」，必然得到修正，成為「極」化理論下的「大國」，或是「全球化」意義下的強權國家。然就此看來，中共的「大國」思想仍不十分成熟，「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的外交思想與「大國外交」的戰略構想之間關係相互矛盾：中國對「發展中的大國」、「區域性的大國」與「全球性的大國」之定位仍未釐清，三者邏輯上不能並存；另中國對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格局」與「多極化」等客觀現象的概念掌握仍十分含糊，影響其對自己「大國」地位作出明確的判斷。

中國亟力在外交議題上、或是實質的外交作為上，建立經濟成長的支柱，積極參與

⁷趙全勝，前揭書，頁 112。

⁸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台北市：生智出版社，2004 年)，頁 44。

⁹余起芬主編，**國際戰略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42)。在某些情況下，大國利益又具有一定的「相融性」，這是大國之間得以進行戰略合作的重要基礎。所謂「相融性」是指在利益需求上的互利和互補，是利益取向的相對統一。

國際事務，急於建立世界上社會主義第一大國，並有意識地將國際關係由「一超多強」轉化成「多極化」的國際體系，欲使未來中國在國際間具備難以搖撼的實力。

二、研究目的

中國具有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之常任理事國的頭銜與權力，無可避免地須加入聯合國派兵的決議，與中國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外交思維有所衝突與矛盾，但也顯現出它並不成熟的一面，而且這個邏輯亦會衍伸影響到中國將其發展為以擴張武力、廣納夥伴協作的大國外交形式，進而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分庭抗禮。¹⁰

中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組織性意識型態的國家之一¹¹，因此，只要中國以社會主義國家自居，對於中國要實行大國外交會產生一種矛盾。

因為，重視民主、民權及自由意識的西方民主政府，必對中共這種堅持以一黨專政的政府相互矛盾，其結果將迫使西方民主政府對它刻意的忽略或是大加撻伐。¹²是故與西方等大國結交，無異是給中國百姓一個對外追求自由民主化的鼓勵，也可能造成中國共產黨的敗滅，此為中共外交必須面臨的現實問題。尤其是自詡為馬列信徒的中國，是不容許其大陸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且不容忍百姓追求人權及不同政黨來領導中國大陸，¹³但當中國與民主體制的經濟大國、政治大國或是軍事大國交往時，想要避免這種思潮持續對大陸的百姓宣揚是有其困難，中共是決不會鬆口及放手在很多意識型態上的問題，表示中國實行大國外交當會有內部的雜音與反對。

因此，中共實施大國外交的方向，是很縝密的考量到經濟發展以外的範疇，如何才能降低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型態造成的傷害，如何才能使這種外交

¹⁰葉自成，「中國外交戰略下的兩岸關係」，《兩岸雙贏》，第 17 期(2000 年 6 月)，頁 22-27。其中包括中共自認本身的國家整體實力比從前要來的好，自信心油然而生，處理國際事件反會更以平常心看待。

¹¹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p34。

¹²David Lampton, "China Policy in Clinton's First Year," in James Lilley and Wendell Willkie ed., *Beyond MFN: Trade with China and American Interests* (Washington, D.C.: The AEI Press, 1994), pp. 15-16. 許志嘉，前揭書，頁 186。「柯林頓在處理中共與美國之間最惠國待遇時，就成立一個專門研究中國政策的小組，…他對該小組制定中國政策的原則之一，就是制定一個不會對柯林頓政府產生不利影響的政策，不招致人權團體的或工商組織的反對。」

¹³趙全勝，前揭書，頁 126。「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對外來威脅非常敏感，特別是那些危及國家主權或政權生存的外來威脅……」

的作為，不至使中共陷於倒台的危機，是最優先的考量。¹⁴

本文主要探討的動機，即在中國是提倡大國外交的路線下，到底會對中國大陸有什麼結果，且在目前的狀況中國的這種的外交方式，若會變成政策，將如何助益於中國大陸的，或是將對大陸造成什麼影響，本研究將逐步探討中國實行大國外交的機會與限制。

¹⁴趙全勝，前揭書，頁 126。「雖然經濟現代化在鄧小平領導之下已成爲北京的主要目標，但這不意味著中國不關心其他問題。國家安全 and 政治—戰略的考慮也被看作同現代化緊密相聯；甚至意識型態的考慮也仍然發揮著某種影響；維持政權像以往一樣仍然是中國外交政策的最優先考慮。」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途徑

一、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一種思考方法，並應探究事實關聯性的邏輯，以找出正確的理論與答案。雖然社會科學的變數很難掌控，但是社會的形成是有其規律性的，因此本論文側重於理解中共對經濟發展、國家利益以及多極格局的方面去了解中共的大國外交政策，由歷史—比較分析的層面，討論中共實施大國外交的可行性，以及未來的挑戰與限制。¹⁵ 本論文因為形成的時間較短，許多的理論須藉由以往的社會科學理論來作為支撐與引導，在方法論來說，必須找出共相且為大家常用的概念，將真實世界中各類關係轉換成符號世界，將複雜的東西轉變成簡單的符號這種方式，在百分之百可以預測的狀況下，就是科學。

因為本題目無法對研究對象(中國)有任何的控制，只能力圖蒐集事實性的資料，再運用文件分析法來對中國的大國外交政策實施研究。所以，在研究的方法上，我們將以中國出版之各項原始資料文件、大陸學界研究之相關書籍、作為研析中國形成此外交政策的依據。並以大陸官方及研究機構的論點來論證其認知的理論；因為在目前大陸學界針對其國家政策，多處於探討決策者對政策影響力的研究，作為解釋外交政策形成的背景，易於有先入為主的觀念，¹⁶ 並且解釋其與世界上的普遍認知有何契合的狀況。我們擬將其與現有之國際關係理論予以論證；另一方面針對中國正式執行大國外交政策下的種種作為與國際間之關係，是否已產生何種之變化。

為研究中國的外交重點方向的轉變，筆者將律定政治、經濟、軍事等三個面向逐一闡述與探討。因此在資料選擇上必須要能符合專題的文獻過濾後，方能提出相關的研究內容，除了年代的分水嶺外，毛澤東時期到鄧小平時期是一段很重要的分界，因為它代表了決策者思考模式轉變的重要一環，尤其是在權威主義下最高領導人擁有政策轉換的最大權限。¹⁷

¹⁵ Earl Babbie著，李美華等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北：時英出版社，1998年)，頁483、511-520。

¹⁶ 趙全勝，前揭書，頁46。

¹⁷ 趙全勝著，前揭書，頁134。「實際上在任何一個國家，無論權威主義還是民主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都在垂直的指揮渠道中進行。」故而最高領導人決定之後，再由各政務及事務機關配合執行，因而可以發現出截然不同的對比。

目前，中國各領導階層的回憶錄、演講稿、談話集、文選等官方文件充斥，這種文件通常是為那一時期為領導人闡述政策理念的最佳工具，也可以確實釐清中國官方當時的立場，吾人也最容易在此類文章上研究分析並且比對出相關的決策佐證。在國外學者方面，美國的學術機構自 1980 年代起，大量的補助中國大陸的學者，並培養成美國新一代的中國研究學者，以他們在中國大陸對政策的親身經歷及觀察結果，並引用西方的學術研究方法，而他們提出的研究成果確能成為有效的研究參考依據。¹⁸透過以不同的觀點上，論證的可信度是有一定價值的，這將使我們對爾後各項變數的分析有較完整的面貌。

因此，對於資料的處理順序，本文是以文件分析法對各事件的結果來反證各變數的相互關係，對照中國對「大國外交」的期許所應影響的面像，是否真能確依中國所期盼的結果，而且在論證的過程中，提出中國轉變外交政策，所產生的中間目標，以此演繹出各階段時期的外交政策是否能符合當代的需求，並利用所得的檢證變數交插分析，論述出分析結果，預測分析未來「中國大國外交」的前景。

二、研究途徑

在研究的途徑上，本文採取歷史的研究途徑與行為的研究途徑併用。David Easton 曾提出：「行為的研究途徑具有技術上與理論上的雙重意義」。¹⁹在此前提下，本文資料的選用以重大的指標性政策及宣言為主，另運用歷史的文件搜羅在此一年間可能有過的理論與影響，由於大國外交的政策幾乎是中國主要針對英美法蘇德等國的外交過程，其他對於第三世界或是東協等，只有宣言或協議等可資運用，至於理論內容主要針對國家利益、國力、國際體系等方向的文獻再予運用和比較；雖然，國際間的衝突與結構不斷有新的發展；但是在不同的研究時空和理論的爭執之下，相對的可以從中獲取更大成果的可能也愈大。

中國學者李少軍就指出，由於現實的國際關係具有複雜、多維的特點，並且現今的

¹⁸ Harry Harding,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in David Shambaugh, ed., op.cit., p27

¹⁹ 朱宏源主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1999年），頁 161。

國際關係理論學派都難以單獨對國際關係做出完整的說明，因此分析國際關係必須綜合各派理論之長處。至少應從現實主義、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三個視角對國際關係進行分析。²⁰

李少軍指出，現實主義是人們觀察國際關係最常用的視角。因此觀察大國之間的交流與發展，很多人是慣於以國家力量的大小來評論與比較，尤其是這種力量的發展以及使用，諸如GDP和軍事經費的成長率，軍事力量的增長與部署的改變，以及針對別國的軍事合作等。現實主義所關注的這種國家間的力量關係，是現實的、客觀的。但如果僅僅按照這種邏輯進行思維，那麼人們獲得的結論只有狹隘且偏頗的結論，即大國的發展所帶來的力量變化，必然導致國際衝突。為了避免片面性，在用現實主義工具觀察國際關係的同時，還必須注意跨國制度主義的分析。

事實上，在國家之間固然存在衝突，但它們之間同時存在更多的合作。即國家之間的跨國互動，使國家有了日益增多的共同利益，並且建立了制度化與規範化的條約、國際組織等。制度主義以合作為特點，也是分析國際關係的重要因素。建構主義是觀察國際關係的第三個視角。建構主義強調的是人們的觀念。如果國家間能夠改變觀念，無論權力關係如何，都可能建立新的關係。近來大國之間建立的各種夥伴關係，其實就是一種觀念的關係。把對方看做夥伴而不是敵人就是觀念的改變。這種改變不涉及力量對比的變化，也不涉及相互依賴的變化，但能夠減少力量競爭可能導致的衝突，並增進因相互依賴而導致的合作。

研究現實主義、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這三種觀察國際關係的模式，應該由這三種主義是一種互補的關係，而不是相互排斥的關係的角度來思考。這三種主義對國際關係的解釋實際上都是有道理的。現實主義解釋了衝突發生的原因，跨國主義解釋了合作發生的原因，而建構主義則解釋了人們為什麼要選擇衝突或合作。由於國際關係中的衝突與合作歸根結底都是國家根據客觀因素進行主觀選擇的結果，因此把這三個視角結合起來，才能對國際關係做出合理的解釋。

²⁰李少軍，「正確看待國際關係理論中相互爭論的學派」，《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3年5月，頁29。

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政治途徑模式中，則著重於中國政治菁英心目中的環境因素和實際環境，認為「國家利益」與「意識形態」兩者對於「國家合法性的建構」都有著很重要的功能，兩者也因此成為中國所有政策決定過程中的必要成份。²¹本論文著眼於中國在對於國家利益前提的切入下，大國外交的外交方向，其動機與其所望達到的目的，對於中國現階段的政經發展會有何種影響，都是可以探討的問題。而且這一方面主張的是，必須綜合考量國際社會敵對或同盟的超級強國的經濟及軍事權力，必須評估哪些政策是最符合國家利益的，然後制訂其外交政策，所以這部分而言，無論是在國際制約上或是意識型態上，外交政策總是不會離開如何使自己在國際間站穩腳跟的任何方法，我們所要作的不過就是怎麼去印證這個方法是否合乎他們現行的作業方式。

在以上的論述中研究的途徑和方法，已經有一個共通的要點，就是社會科學的各項理論變項，要能符合中國現行的政策走向，能夠解釋中國發展的外交策略。從方法論及研究成果的角度來看，美國學者一直是中國外交研究方法探討與分析的主要參與者，早期中國大陸的學者對中國外交的分析，多是以「外交史」為研究的主要範圍，就以中國的「官方說法」作為分析的主要依據。就以台灣學者在早期論及中國的外交政策多著墨於意識型態及統戰等觀點來解釋，以鮮明的「反共」色彩來討論，研究的領域僅限於外交史為主，這樣的研究已經有著更多元的研究，近期受到西方研究成果與方法的影響，已經逐步運用各種研究途徑，對中國外交相關議題進行解釋性的分析。

這樣的發展對中國外交的研究方向，造成很豐富的成果，也帶來各種不同的論述，因為究竟這是一個非常廣博的一門學科，不可能僅就史籍的現象來直接論定，是會造成很偏頗的印象。因此在台灣的學者許志嘉依各家的學說論點劃分出九種對中國外交的研究途徑，包括歷史文化、意識型態、國家利益、決策領袖個人、戰略三角、國際體系結構、派系政治、決策系統及多元因素等。²²這些都是因年代的不同、各時期的研究思潮，以及學者所處的研究環境所限制而出現，但大抵不出這九種，雖然各有其理論基礎，及學者在部分變項上的堅持，但不會影響研究的成果，不過就以年代區分下，1960年

²¹潘兆民、黃烈修譯，*中國政治與社會*(台北：韋伯文化)。

²²許志嘉，*當代中國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p4。

代以歷史文化、意識型態、決策領袖個人、國家利益等研究途徑為熱門的研究途徑。1960至1970年代就以戰略三角以及政治研究途徑為主流，至1980年後決策系統及國內外多元因素研究途徑，已漸漸受到學界的重視。

本研究對中國實行大國外交的研究途徑，主要以國家利益與戰略三角的研究途徑來論述，如何確保共產黨能持續的與西方世界相抗衡；也要以外部的威脅以及內部的壓力，來論述由毛澤東到鄧小平期間，這種外交執行面的轉變，²³所以中國對於國際間的交往，已逐步修正他們的政策走向，而不是以極度的意識型態來主導中國的外交政策。

²³趙全勝，前揭書，頁127。「同毛澤東時代相比，鄧小平時代的北京領導人較少感到外部世界對其生存或國家主權所造成的威脅，並且認識到靈活性和國際合作，特別是經濟方面合作的優越性。」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論文所探討的範圍，依時間論應是官方文件出現大國外交這個名詞的時間起算；然這種大國外交的行為仍是持續執行著，筆者自 1979 年開始起算其內容範圍，探討其現行的外交行為。

現階段僅經歷短短幾年，且國際體系的轉變，均在預測階段；但中國總體國力持續昇高，相對的除預測性的理論(中國威脅論)與改革開放後之國際評估，各家學者有著南轅北轍的看法，亦有著不同的見解與偏見。

除了需要驗證中國的綜合國力，在數據方面對中國的國力的評估，必須多方參照，在 2001 年 10 月中國官方公佈的國內生產毛額年增率，經由美國賓州匹茲堡大學經濟教授羅斯基證明其近四年的官方經濟成長數據確實失真。²⁴因此在中國國內綜合國力的評估，實不能只靠中國官方提出的數據來作為衡量，必須多方採集相關或間接相關的數據才可最為準確的研究與解讀。其次對於中國近年來的與各國發展的夥伴關係，戰略協作關係與發表共同宣言需逐一律定。

「大國外交」這個名詞可以用兩種方向說，一是同世界上各發達國家交往；二是基於民族主義的興起與對傳統中國的優越感，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回復到世界大國的地位。²⁵自然其對各國家的外交方式就叫大國外交。我們就以上這兩項概念必須定義清楚，在所建構而定義上，大國外交必須分化成各個名詞的系統，例如語言的句子、邏輯的符號、或數學的記號，透過定義的界定、概念所指涉的經驗世界變得以表現出來，²⁶所以，建構出問題之前，就依照所定義的方向，概念才會應運而生。而中共的「大國外交」是讓人矚目的一個政策執行方向，雖然它與國際體系和中國國內政策利益的關聯，是一種「抽象性」概念，但就字面涵義上、或者是他曾經影響過什麼事件，就連續、關聯的事務，套用前人所沿用的經驗，對於了解其全貌或是未來的預測，這將是其所必經

²⁴范錦明，「台商慎防中共官方失真數據」，《兩岸經貿月刊》，第 125 期（2002 年 5 月），頁 10；文中指出中共官方對於各項的成長數據和指數，常流於浮報，造成失真狀態，並容易造成經貿上的判斷錯誤。

²⁵黃奎博，「冷戰後中共對東南亞國協之政治合作」，《國際關係學報》，第 15 期，頁 198。

²⁶唐納博士著、馬康莊譯，**社會學理論的結構**(台北：桂冠圖書公司)，頁 4。

之過程。

本文必須沿用前人的理論，適時跳脫具體的時空之外，以避免現有的境況無法合理解釋。因此，在社會科學各種行為上抽象的概念，應時時檢查與欲論證的事實其中的關聯性，否則其概念之於我們，將無所用途。因此本論文針對中國外交政策的主體與實踐是基於三方面：第一方面為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關係理論基礎，第二方面來自於國際現勢的境況，第三方面來自於中國官方及民間學者專家所著的專書、公報、備忘錄、宣言、公約等述諸文字的決策，以呼應現有的理論基礎。

就戰略三角、國際體系與國家利益的範圍來談中國的大國外交，提供國際與國內環境不同省思的層次，國際環境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影響，這樣將對於中國實行大國外交的討論面向更趨多元，而不單就一種議題來做武斷的結論，因為以許多的研究途徑來看，中國實行大國外交已經不是對於意識型態的轉變、國際社會與結構的不變與中國決策者的影響所能解釋的；單就國家利益部分，中國雖已是國際體系的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照理說應該會維持其既定的外交方向，不需要與其意識型態相左的民主體制的大國交往，而造成可能對中國政權動搖的風險；而且中國仍然是一個將外交政策的制訂是由國家權力中心以自己的思維去運作的，經由理性的分析，採行對中國有最大利益的政策；²⁷因此，參酌各個研究的系統下，對於中國外交政策的研究，才可以更客觀與科學化。

二、研究限制

中國的研究，在早期是以意識型態為主要的研究，針對是以宣導「匪情」為主，對政治性的服務大過對理論的研究，陳述性高過於實驗性，但是，這也間接的針對毛澤東的思想路線研究與決策者的決策模型的建立，給予西方學者的研究，事實上是又增加了一個可研究的途徑；但是，就以對中國政策的研究，所包含的研究方式與途徑，大抵常用的方式有九種，這些研究方式與途徑在不同的年代，也得到不同的結果。

因此，以學科而論，所希望得到的成果是愈多元愈好，能實證到中國的外交政策是更好的事，不過以目前這個題目的方向，我們僅以戰略三角、國際關係與國家利益來這

²⁷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頁 25。

三項來論述。第一，比較能突顯出外在的環境對決策者的理性思考所產生的結果；第二是以國際關係的狀況也就歷史的概況中，也能反觀到中國在任何一個年代所產生的外交概況，進而瞭解其外交政策，因而在年代的更迭中，我們可以逐步發現中國外交政策演化的過程，進而論證出中國是不是實行大國外交，而不見得要能內窺到每個年代決策者的決策構想；第三是國家利益的部分是世界各國在基本國策中，絕對奉行的原理，就算是以意識型態為主的國家，也不能免除為了國家利益所必須的妥協與對外的邦交，雖然那時的國家利益必須與黨或個人的利益要相結合或關聯。

就這個部分，我們必須採用以中國學者為主的文獻與事實，不過，中國學者對於中國外交政策的研究，多是屬於以敘述為主，這和他們必須避免因黨政的意識型態的束縛，而對研究上面有著偏頗的理論，而且以就以西方學者的眼光與實證中，社會科學必須強調學術著作格式，以嚴謹理論與實證的契合，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比較難以上世界各國的學術論著所採用，但中國改革開放後，學術性的文章與著作增多，與世界接軌及以更理論性的方面，論述中國的外交政策，才會得到比較具中肯的結論。然而，我們對於文獻在這方面的部分與理論能否結合，判斷的概況較容易流於武斷，因為單就以中國學者的論述來解釋大國外交，是並不能完全代表一個學術理論基礎的建立，至少信服力是不足的。

大抵上就中國學者來說，國際關係的政策性研究較多，學術性研究的較少，預測路線研究得較多，基礎理論研究的較少；我們或者可以解釋成中國學者在實證上與學術上的興趣，比較偏重於可資運用的概況，因為這些部分比較容易見容於中國大陸的政府，因為就他們而言，學者必須是要以服務為主，對政策服務、對政策者服務與對宣揚上服務；而絕少數以對學術而服務，所以系統性的研究方法在中國大陸不甚受到青睞，相對以我們運用中國文獻者，會有一點缺少理論性與實用性。

一般而言，中國大陸的學者比較會針對國家利益的部分著手，就是這些具有顯性與指標性的外交行為，來討論與詮釋中國的外交政策，如此也不容易受到，政治上的干預，造成對於研究上的偏頗。中國大陸的外交官也逐漸受改革開放的影響，願意將許多的回憶錄等著作釋出，這使中國大陸的學者能瞭解更多的中國外交行為，也能以更多數的資

料供各地學者參閱及分析，有助於中國對外交政策演變的研究。這對西方學術界來說，還是起步甚晚，但是比較起以往的馬列主義意識型態的論述方向，引進西方學術與理論來說，是更能產生多元與豐富內涵的研究成果的。

因此針對中國大國外交形成的時間，我們是以 1960 年代以後的狀況來研討，除了引述當時的中國學者的論述部分，我們更需要將對中國大國外交政策，必須拉長時間從冗長的敘述或是解釋，也可能因為舊有的政策導引，使得中立性不足，我們能否將主要性的大事紀要分析清楚，舉證的事件愈多，印證歷來的演進也會愈多，但可能造成的不客觀也可能在所難免，所以我們在選就學術理論的印證上，戰略三角以及當時的時代價值，與創造出的國家利益，再轉到以國際關係中外在的因素，影響內在決策者的理性判斷，以致於如何以國家利益的部分來解釋中國大國外交是否是必須走的路，這些都是以數個理論來論述、解釋甚至論證這些到底是單一反應決策者的決策現象還是產生的政策，能否得到一個適切的答案，是我們最須注意的。

第四節、研究架構

本文分析研究採用戰略三角、國際關係與國家利益等三個研究途徑所建立的架構，其中是以現實主義的境況來闡述這些東西存在的理論。但是，這將會是一種容易變成備多力分的可能，因為我們只想就中國實行大國外交是不是政策，是不是可行要加以論述，而不是去探究其做出來的成果是什麼，所以在結構上，疑問的部分不將是主要的內容，那對本文的幫助不是很大，而是就以事件套用於戰略三角中，以當時的時空背景，能不能就這樣的將一個政策的轉變，做出一個敘述與學術理論的對應。

雖然研究的架構是以這種方式，另外不能避免的需將中國的外交行為與國內政策及國力評估等間接關係對所論述的理論，依照理論的模式代入，將各項變數與依賴變數確實釐清，因為本文將多次提出間接相關的方式，在研究架構上，我們就變數等問題採用可以衡量的方式，以獨立變數、依賴變數及中介變數的的律定，以取得所期望的結果。不過，中國外交路線的研究，會發現一個狀況，就是中國講究實踐的理論，與西方的現實主義（realism）及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相近，因為中國在對國際關係與外交立場上，明確的自訂地位是一個國家的行為主體，並不贊成國際社會是具有限制規範的，以強調國際社會是屬於無政府狀態的，因此國家的權力是沒有人可以侵犯的，國家利益由此產生，安全就是國家利益最大前提外交目標，各國都應享用也等於各國都不應侵犯他國的一切，這些都反應在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中所提起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中，所以國家對外行為的目的正是追求最大的國家利益，各國為擴充本身實力而彼此競爭，權力鬥爭自然就會變成普遍現象，道德與意識型態反而在外交決策中不是挺重要的。

再者，中國的外交實踐與「新現實主義」相似處，在於中國很在意國際體系與體系變動間的制約力量，強調「權力平衡」。因為就中國的立場來說，權力平衡是指認清當前所處的國際環境與國際間潛藏的矛盾，運用折衝連橫的策略，從中尋求最大的國家利益，但是，新現實主義對於國際合作向來是處於悲觀的態度，認為國家間追求國家利益，固然有合作的可能，但是考慮到「絕對利得」與「相對利得」時，認為雙贏的可能性很小，國家會關心他國獲利的狀況是否超越自己，進而威脅到本國的安全，也會因為擔心受制於國外的控制，而拒絕合作。因此，我們的研究架構中就非得以國家利益的狀況中

獲取，中國是否能在大國外交上獲得利益或是因為害怕他國的利益遭致自己的國家利益降低，而開始拒絕與特定的國家合作。

就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官方普遍強調對外開放的重要，中國對外關係的主軸似乎轉向「自由主義」(liberalism)，但是，中國改革的目的是為了改善大陸的經濟與突破因「二極體系」破滅後，在「一超多強」與中國威脅論的影響，中國必須要有所外交突破，所採取的權宜之計，因此中國基本的現實主義心態是建立於加入國際組織是否能在其中獲利，只有獲利的狀況下，中國才可能考慮加入；如果多邊協商中會造成中國的利益持平但對他國造成增長，甚至認為會造成中國的威脅，中國的態度將是持續的杯葛，或是循雙邊的管道解決。中國相當關心他國在多邊合作中所獲得的利益是否大於中國自己，或是未來可能會對中國的長遠利益造成威脅。尤其是在涉及主權問題，這不僅是對中國政權合法性及是否對中國對內政的干涉部分，中國的立場更是強硬。

根據現實主義理論，國際體系的穩定和運作，係由大國關係決定，因此，我們已在研究途徑論述，中國必須獲得最大的國家利益，對其政權合法與穩定交代，當前中國最主要的工作是追求發展，以利早日成為世界一極；在中國實力增強下，中國必然將在國際間擴大其影響力，對於許多問題將會有自己的立場，就以眼前的人權問題以及長遠的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合法性問題，就可以瞭解其用意。

架構的問題在於中國為何要走向大國外交，他會成功或是失敗，是要以很多的面向來討論，不能單就一個理論來研究；中國對各個大國間的交往，在其國際地位與實力不能與其他強國平衡前，中國對外將維持低調，與各國合作，減少對抗、消耗，只有在涉及中國國家的安全部分，中國是以國家身份非常強硬的面對，這種部分我們就必須以國家利益、國際關係之戰略三角、結構現實主義這三方面的理論去解釋，因為中國的大國外交必須是以多元化的面向去討論，不僅是一種單純的理論去解釋，這樣將流於偏頗；至於主權及社會主義理論的意識型態上，這將是未來的一大問題，因此，中國寧可強硬的堅持立場與保持強硬的態度，這和中國自建政以來通常不會變的外交實踐，一切與現實主義學派相吻合。

我們在這些面向為前提下，以其歷史過程以及對於外交決策行為後的影響，假設為

中國提出的大國外交是對其國家利益有正面的意義的，其分項假設則為以下三點：

(一)、國際體系在經由冷戰結束後的確在轉變，由世界公認的「二極體」系到現在的「一超多強」的局面，中國期望的「多極體」的國際結構，將因為其「大國外交」的作為方向，而自成一極，以延續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國家，避免遭西方民主制度社會國家所同化，步入前蘇聯的下場。

(二)、在競爭又合作的方式下，中國曾經「大國外交」的形勢下，除了自許轄內國土、人口、物產、軍事乃至經濟力持續攀升之下，將成為社會主義第一大國，並在以中國固有合縱連橫的思維中，體現戰略三角的外交行為，力求左右逢源的態勢，更加穩固國家利益的穩定。

(三)、就國際間刻正統合、聯盟等形式的國際組織並起，也會造成政治或經濟上「均衡」的格局，也藉由與發達國家的交往，運用多重關係，提升自己的格局，可以使國勢與國際地位同步拉抬，其國家利益與執政黨之利益將得變牢不可破，他國自然無法干涉中國的政治權力，更不用講要質疑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二、研究理論

冷戰後現實主義理論內部的諸分支 現實主義常常被認為是國際政治研究中占主導的理論流派 (approach)，而且冷戰的結束、國際格局的變動刺激著國際政治理論的創新。在理論與現實的互動以及現實主義與其他理論流派的辯論中，學者們逐漸認識到，嚴格說來，現實主義不是一個大一統的、單個的理論，而是一個「理論群」，其內部存在多個分支。對於眾家的理論與多方面的探討既可以加深我們對至今依然是國際政治主流理論之一的現實主義理論的理解，同時也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弄清現實主義各理念分支的政策含義，這對於國際政治與對外交政策影響與發展的這樣一門現實性、政策性很强的學科來說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直到今天，現實主義仍然被認為是國際政治學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研究綱領。有的學者還進一步指出，現實主義不僅是一種「科學的」綱領，它更是一種政治或者說是世界觀——所有的現實主義者都對人類自身的狀況、道德進步以及建造一個和平與和諧的世

界的人類理性的能力抱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悲觀態度。對現實主義者來說，國際政治是人類集團與集團之間為獲取安全、威望和權力而進行的一場持久的鬥爭。

羅伯特·吉爾平認為，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及馬克思主義一樣，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哲學理論，而不是一種可以證明或證偽的科學理論，但從現實主義的理論預設中卻可以引申出人類主要不是以個人而是以他所效忠的集團的一員的面目出現的，而作為社會政治生活基本單位的集團之間則是彼此衝突的。從歷史上來看，集團的基本表現形式曾出現過多種，如部落、城邦、帝國等，在現代世界，衝突集團的基本形式是民族國家。

Benjamin Frankel 認為所有的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都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下列共識：首先，以國家為中心，國家是國際政治中最重要行為體，在考察國際政治時，現實主義者一般來說更注重解釋國家的行為，而對個人以及類似跨國公司和國際組織這樣的跨國行為體則不太重視；其次，現實主義者將無政府狀態視為國際生活的主要特點，在他們看來，由於國際社會中不存在統一的權威來保證協議來付諸實施並提供安全保障，所以各國必須依靠自身的力量來維護它們的利益，現實主義者雖不否認國家之間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國際制度的作用，但認為它們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三，國家謀求自身安全或權力的最大化。第四，國家對外行為的動因應該主要從國際體系中去尋找。第五，國家在追求權力或安全時奉行工具理性政策，但理性並不總意著成功。由於並不是總能夠獲取必要的信息，並且即使是能夠獲得信息，也還能保證信息正確，所以國家可能會判斷失誤。第六，重視武力的作用。國家依靠使用武力或者威脅使用武力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和加強自身的，預言軍事力量的作用已然喪失尚為時過早。

國際政治中的現實主義分為傳統（古典）現實主義和結構現實主義，這早已為人們所熟知。兩者的區別可歸結為兩點。首先，傳統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就是要不斷地謀求擴大自身的權力，權力被視為目的本身，對權力的追求植根於人性當中；結構現實主義者則認為，權力雖然重要，但卻只是一種手段，國家最終所關心的並不是權力，而是安全。其次，傳統現實主義重視國家之間的差異，主要通過單元層次上的分析來解釋國際政治後果，而結構現實主義者則主要從結構層次入手，認為國際政治後果主要應該從國際無狀態和力量分布上來解釋。

近幾年來，從結構現實主義流派中又逐漸深化出攻擊性現實主義和防禦性現實主義兩個分支。兩者均認同結構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即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安全通常是國家追求的首要目標。兩者的分歧則主要體現在，雙方在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性質、國家對此所可能作出的反應以及國家如何才能獲得安全等問題上意見不一致。

攻擊性現實主義者強調國際體系的霍布斯主義性質，在他們看來，國際體系中的無政府狀態使得世界局勢不安，為獲取安全而展開的激烈競爭迫使國家採取攻擊性的戰略，結果便常常導致衝突和戰爭。正如米爾斯海默所指出的，「最初的動機是防禦性的，但國際體系的結構迫使國家去作攻擊性的思考，有時則是採取攻擊性的行動。」這一派學者而言，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內部差別相對來說並不重要，因為來自國際體系強大而直接的壓力會使在中處境相似的國家採取相近的行動，而不論這些國家自身有何特色。要理解一國為什麼會某一特定的行為，人們首先應該考察該國的相對力量和外部環境，因為這些因素將決定國家以何種方式來維護其自身的利益。

但是，攻擊性現實主義者卻不是主張國家一味推行擴張政策（擴張是為了得到利益與安全，如果經評量之後不是如此，理性的國家就不會去擴張），他們只是認為，國家問題為其安全而擔憂，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存在以及國家間相對力量的不斷變化使國家總也不能認為自己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安全問題，國家無法確認自己是否是絕對的安全，不過，他們很難得去猜測其他各國是否會影響他們的安全與利益，在臆測中而且發現自己的力量和他國之間的力量是不甚均等時，他們會運用一切方法來壯大自己，不僅是有明確的敵對國家，而更是要以預備的心態整軍經武，逐步擴張來避免可能性的災禍。與攻擊性的現實主義者而言，防禦性現實主義者就比較樂觀一點。他們的分析邏輯是，如果一個國家是理性的，那麼它可以通過計算擴張的得失損益，通過從以往奉行侵略擴張的國家往往會引起其他國家的制衡而最終導致失敗的歷史中汲取教訓，進而約束自己的行為。也就是說，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並不見得導致激烈的衝突和戰爭，它也會促使國家採取溫和、慎重和有節制的政策。

由此，防禦性現實主義者認為，一、國際體系的安全並不是沒有，而是充足的；二、國家獲取安全的最佳途徑通常是採取防禦的戰略，或者說是旨在維持現狀的戰略；三、

在某些特定情況下，例如攻擊－防禦的平衡關係有攻擊一方動作時，不是追求安全目標的國家之間可能會因「安全困境」的加劇而彼此發生衝突。但在多數情況下，國際體系是平穩的，「安全困境」的問題並不嚴重，國家的動員主要限於國際體系內的某些特定威脅；四、如果一個國家採取一種不計後果的態度，那麼應該從國內政治的多種因素而不是國際層面去尋找。

基於上述不同認識，攻擊性現實主義和防禦性現實主義針對當前現實政治中一些問題所作出的分析也便出現了差異，甚至是根本的不同。米爾斯海默於 1990 年蘇聯解體期間發表的論文《時光倒流：冷戰後的歐洲》是反映攻擊性現實主義思想的代表作。在這篇論文中，米氏對和平遠景感到悲觀。他認為，歐洲之所以在過去 40 多年和平，主要因素有三個：其一，這段時期歐洲處於兩極體制之下；其二，構成兩極的美蘇兩國軍事力量大致平衡；其三，大量核武器的存在。米氏指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必然導致國家間彼此競爭並可能發生戰爭，因為多極體系的不確定性和複雜性，使二次的世界大戰爆發就是很好的例子。相形之下，在兩極體制中，由於真正的大國只有兩個，它們彼此之間力量相當且相互制約，因而不大容易發生戰爭。換言之，兩極體制比多極體制更穩定。這種穩定性在戰後歐洲部署有大量核武器的情況下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因為由相互確保摧毀所產生的威懾可以成為『恐怖的和平』。但是，冷戰的結束使維護戰後歐洲和平的這三個因素均發生了變化。歐洲的兩極體制被多極體制所取代，大國的力量分布和核武器的分布前景也變得模糊不清，這使未來的歐洲已不會再像過去的 45 年那般穩定，歐洲有可能回復到以前戰亂頻仍的時代。

防禦性現實主義的範埃弗拉則對歐洲安全遠景的分析比較樂觀多了。首先，範埃弗拉並不認為多極體制比兩極體制更穩定，因而歐洲國際關係向多極體制的過渡也就並不意味著戰爭的可能性增大了。其次，在範氏看來，在歐洲爆發大戰的體系層次和國內層次上的原因目前已經或正在消失。從體系層次上來說，核武器的大量存在、美國對歐洲安全的承諾以及知識經濟的發展改變了以往歐洲大陸"攻擊－防禦"關係中對攻擊有利的狀況，從而消除了戰爭的重要隱患；從國內層次上來說，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衰微、民主主義的發展、社會分層化程度的下降、由革命精英所統治的國家漸漸消失等，

所有的這些變化也都有利於和平的維持。當然，由於東歐原有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秩序的崩潰以及蘇東巨變使原來被壓制的民族衝突和邊界爭端有可能重新凸顯出來，現在還不能說歐洲的和平、特別是東歐的和平已經有了保障，但可以認為冷戰後的歐洲已為和平作好了準備。

冷戰時期，兩極體制主導全球，與之相呼應，強調結構推理的新現實主義理論也在國際政治學界中占據中心位置。從目前來看，冷戰後國際衝突的原因主要來自於國家目標的不同和各種民族矛盾的激化，現實主義者們紛紛作出反應，他們或是對之加以補充和修正，或是對現實主義思想進行全面反思。

在過去半個世紀中，現實主義學者曾深入探討了國際政治中所發生的三大變化，即兩極體制和核武器的出現給世界政治所帶來的影響以及發達國戰爭的減少。涉及到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性質、該性質對國家戰略的影響、國家對外目標的差異以及國家能否從歷史中汲取客觀教訓等一系列重要問題。儘管這些討論目前還不能為我們提供確定的命題，但毫無疑問，討論將會為我們提供新的啟發，並有利於關鍵概念的進一步澄清，有利於現實主義與其他範式，如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範式進行更具建設性的對話，所有這些都會對現實主義理論的進一步發展產生積極的作用。

最後需要補充的一點是現實主義理論是一個內涵異常豐富的複合體，其強大的包容性、核心假設的統一性和相對穩定性以及由其內部論爭所體現出來的靈活性和創新性使其能夠長期居於國際政治學主流範式的地位，這種狀況看來並不會因冷戰的結束而有什麼變化。

以現實主義的各個面向與流派，也可以論證到目前中國所處於的地位，及其所望的地域，如何與攻擊性或防禦的理論相結合，這樣討論大國外交的理論基礎才有依據，對於中國的外交政策發展，也會對各個學習國際關係與政治的人有具指標性的啟發，所以我們認為在學習大國外交的政策上，外在的因素與理論基礎，就必須在以現實主義的架構中去探討，而不僅以事件來推敲這些來源因素，那就非常不具有學術性的價值，至少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 也就是剛剛所一直介紹的新現實主義）主張國際體系中大國力量分配的狀況，決定國際政治結構的性質，中國的大國外交或可適用，也正

好討論中國大國外交的機會與限制因素。

就在結構現實主義所討論大國的變項中就提到，「所謂大國的衡量標準是人口的多寡和領土的大小、資源的儲量，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政治穩定性和能力」²⁸。針對主體的概念、建構行為主體(agent)與國際體系的關係予以探討，²⁹因為他牽涉到的分析因子包括權力、國家利益、國際體系、安全等議題；因此，對於中國大國外交政策的建立，其實在途徑上，我們已經將他劃為以結構現實主義出發的論點，並劃分各有戰略因素、經濟問題與國際體系建立的問題，也希望僅就這三項予以敘述與研討，逐步找尋中國大國外交可能性的發展。

28 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第33卷第3期（1999年夏季），頁25。

29 盧業中，「主要國際關係理論中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之比較研究」，《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9卷第2期（2001年12月），頁23-24。

第五節、文獻回顧

關於直接論述大國外交的文獻，目前在國內並不多見，而且對於其所可研討的議題，大多屬於間接相關於本文假設的各種關鍵詞句上；因此，我們能有多大的創見，將取決於爾後研究的方向是否持續旁徵博引的將所望的假設，加以論證成肯定或是變成否定。在文獻探討上，就以結構現實主義、大國戰略等相關字義來找出其有可能的直接相關與間接相關部分，以做為本文以後撰寫研究的借鏡。

以結構現實主義來說，邱坤玄教授在「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國大國外交格局」一文中以結構現實主義的要件，描述與推演中國大國外交的行為模式，以現有中國所建立的制度與意圖，藉由文獻的分析來加強論證其行為模式，導入結構現實主義的範疇；就本文所假設之問題中，將會確實引證「系統的結構，國際結構由無政府狀態，國家與權力的分配所組成，無政府狀態與國家是運作的基本形式，屬於不變項，對於國際結構不產生實質的影響，權力的分配才是真正決定國際結構的重要變項，不同的國際權力分配型態產生不同的國際結構，而不同的國際結構和國家所處的地位，會決定國家對外行為」³⁰之論點，因為我們想藉由此項論述，間接引申其大國外交的行為與改變國際體系的關聯。

對於中國的外交政策部分，我們就以戰略三角的概況來分析以往的文獻，其中的絕對要討論到國家利益部分，不僅是以回顧來論述，而是必須就其內在討論，任何兩個行為者之間的關係是由「內在因素」(Endogenous factors)和「外在因素」(Exogenous factors)所決定，所謂內在因素是指兩個行為者彼此在安全、經濟和意識型態領域內的相互作用會對彼此的關係造成影響。而所為的外在因素是指兩個行為者之間的關係受到第三者和這兩個行為者之間個別關係的影響。兩個行為者之間的關係是敵對的，或是友好的，或是介於其中，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共同作用以決定兩國間敵對或友好的關係。

內在因素因為包含了安全、經濟和意識型態等各種不同的國家利益，因以彼此之間並不一定相合，例如兩個國家可能是長時期的盟友，但是在經濟利益上卻又相互衝突，而彼此的意識型態和政治制度更是格格不入。就外在因素而言，一個國家可能覺得應該疏離自己朋友的敵人，但是為了取得樞紐的地位，又希望和三角關係中另外兩個國家都

³⁰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頁 25。

維持良好的關係。內在因素更可能和外在因素衝突，例如兩國之間在安全、經濟和意識型態方面都有相互配合的國家利益，但是由於受倒第三國的影響，卻又不能發展正常的關係。衡量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之間的輕重，必須依個別的情況來認定，不能以相同的思考方向論斷。但是，通常國家安全的利益會超過經濟利益，而經濟利益又超越意識型態的利益。³¹ 外在因素，或是第三者因素，主要是表現在三種「延伸關係」(derivative relation)。延伸關係是指本國對他國的態度是由本國和第三國之間的關係來決定。

第一種關係為「敵人的敵人是朋友關係」，當假設甲乙丙三個國家關係，甲對丙的態度原本是中立的，甲對乙的關係以及乙對丙的關係都是屬於敵對的狀況。當甲要決定對於丙的關係時，內生因素不會造成影響（因為假設的狀況中，甲和丙之間沒有利益的關連和糾葛，而且本來甲對丙的態度就是屬於中性的），這段時候甲對乙的態度會是藉由乙和丙的態度而生。因為乙是甲的敵人，而乙又是丙的敵人，這層的關係容易造成丙會和同為乙的敵人：甲親近；因為這樣以同盟的關係容易將乙對自己的利益損害降到最低。

第二種延伸關係是「朋友的敵人是敵人」，同樣再假設這種狀況就是，甲和乙是友好狀態，而乙和丙是敵對狀態，原來甲和丙的關係是屬於中性的狀況下，這種關係的決定在甲對乙和乙對丙的狀況下。由於甲與乙是屬於親善的狀態，而乙對丙是屬於交惡的狀態，基於朋友的壓力之下，甲對丙會採取敵視的立場；但是丙對甲的地位和甲對丙的地位不近相同，所以丙對甲的態度是不適用於第二種延伸關係的。

第三種延伸關係有兩種類型，都是關於對敵人的朋友的態度。就友誼來說，敵人的朋友應該是加以排斥的，但是在國際關係上冷靜的計算會帶來不同的結果。如果敵人的朋友力量微小，或是根本無法和其溝通的狀況下，則適宜對之採取敵對和制裁的態度，也就是「敵人的朋友是敵人」。如果敵人之友具備相當的實力，或是在態度上對於敵我意識有若干的彈性，則應該加以拉攏，進而打擊對手的聯盟，這就是屬於「敵人的朋友

³¹ 1994年美國柯林頓總統本希望以最惠國待遇部分要求中共改善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但是到了中國大陸之後卻因為經濟上的利益，而把最惠國待遇的問題與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分開討論。Robert G.Sutter, "The Taiwan Crisis of 1995-96 and U.S. Domestic Politics," paper delivered to the Conference on the Secur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After the March 1996 Mini-Crisis ,Tamkang University, July 10 1996, Taipei。

是朋友」。假設甲和丙的關係原本是中立的態度，甲和乙是敵對的狀況，但乙和丙又是親善，此時，甲對丙的態度就必須視丙的力量大小和態度彈性來決定。甲對丙有可能是敵對，也可能是親善的，因此「負正不定」。此時雖然直接從甲、乙和丙的關係結構當中沒有辦法決定甲對丙的關係態度，然而這種狀況是由外生因素所影響的，而不是甲和丙之間內生的，所以這仍然是延伸關係。

所以在一個戰略三角當中，三邊關係就是透過外在因素對彼此產生影響，這些影響有些是加強了原有的內在因素（例如敵人的敵人原本就和我有緊密而互利的經貿關係）；有的則是和內內在因素衝突（例如朋友的敵人和我方有緊密而互利的經貿關係）。因此當內外因素相互增強或抵消之後，兩個行為者對於彼此的態度便可以確定，而雙邊關係的性質也就明朗了。

當研究中國的大國外交政策中，我們可以發現到，中國對內在因素的國際關係中，通常是利用各種方式，要將本國的地位處於一個左右逢源的關係中，這樣才能對於本國的國家利益得到最大的公積數；往前推算出，在鄧小平決定改革開放的政策之前，中國對於國際間的友好國家的內在因素意識型態的因子是佔絕大多數的部分，也因為這樣的狀況下，中國與世界上各大國間的交往，僅限於前蘇聯，以及對美國等西方國家不甚友善的第三世界國家。

我們可以就上述的國際三角關係中來研究其中的演變過程，就必須討論各角色的地位，因為我們就以第三種延伸狀況來說，有些的角色是屬於左右逢源的，也有的是屬於孤立無援的，端賴各個國家對角色的扮演，以及運用各種內在因素及外在因素。這些角色，有些是明顯有利的；有些是極其不利的。就這種狀況可以認定六種角色：樞紐（pivot）、朋友（friend）、夥伴（partner）、側翼（wing）、敵人（foe）和孤雛（outcast），他們分別出現在不同的三角關係中。樞紐是在戰略三角當中最有利的一個角色，他和另外兩個行為者（側翼）都維持了親善的關係，但是他所相對應的兩翼卻可能是敵對的狀況，樞紐可以搖擺在兩翼之間，誘使兩翼為了博取樞紐的友誼而付出利益；也可能利用各種關係使兩翼之間的猜忌加深，防止兩者和好，除了增強兩翼追求樞紐的友誼與認同，也避免兩翼合謀。就這樣看出來，樞紐的利益通常是建築在兩翼之間的敵對，是屬

於第三種延伸關係之上。因為對每一翼而言，樞紐都是他敵人的朋友，是必須爭取認同的對象，因此側翼對樞紐的態度會非常的親善，並且給予相當的利益。當側翼甲對樞紐的態度不夠積極的時候，樞紐就可能以任何藉口與另一個側翼乙有更強化的友誼關係，側翼甲就會產生被孤立的憂慮，進而會被併吞或是降低自己實力的感覺，自然會努力的改變對樞紐的態度。

在討論第三種延伸關係的時候，「敵人的朋友是朋友」成立，這種地位的狀況就可能是樞紐的角色，這個國家必須有一定的實力，方能成為得到特殊對待的國家，同時他對各國的態度必須是有彈性的。樞紐在戰略三角當中的優越地位就是在第三種延伸關係之上，因此他必須時時保持一定的政、經、軍實力，以及對兩側翼國家保持彈性的態度。如果樞紐的實力太小，兩翼當中任何一個側翼國都可能運用軍事力量或其他的強制手段迫使樞紐改變對於另一側翼國家的態度，這就變成「敵人的朋友是敵人」的情況。此外如果樞紐對於任何一側翼國的親善態度不變（不論是由於內生因素或是由於過度的擺向策略，*tilting*），則另一側翼國將缺乏了追求的動機，也就是樞紐國自己將必須對其他側翼國彈性態度喪失，樞紐就會成為另一側翼國的敵人，其樞紐角色也就喪失；而且受親善的側翼國因為另一側翼國對樞紐國關係的敵對，他也將會認為爭取原樞紐國的用意與動機逐漸喪失，也就沒有必要完全依賴樞紐國；由此可以看出來，樞紐國必須始終保持對另兩個側翼國的彈性態度，若只對單一特定側翼國親善的狀況，是對樞紐國地位及角色非常不利的。

雖然，樞紐除了必須擁有一定的實力，同時保持對於兩翼的態度彈性之外，但也必須要抗拒第二種延伸關係所帶來的壓力，也就是不能因為對其中一側翼國友好，而對另一側翼國採取敵對的態度，這樣樞紐的角色就會因而喪失。要處於樞紐國的角色要件必須是對另兩個側翼國持續的友好，但也必須運用一些手段，使這兩個側翼國持續保持敵對的態度，但是，當某國希望持續擔任一個樞紐的角色時，他卻很難有效的控制另兩個側翼國的內生因素。所以就以樞紐的角色而言，這種狀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我們僅就這種國際三角關係實施探討，因為就此種狀況而言，至少對於很多想在國際間左右逢源的國家中，他們多半極力的要使自己能儘量處於樞紐的地位，或許沒有成為樞

紐的實力，至少也要成為另一種「夥伴」的關係。所謂「夥伴」是當三個國家關係中，其中兩個國家彼此友善，對另一個國家敵視，被敵視的國家就會變成「孤雛」的角色，這通常是一個希望成為樞紐國不成，但至少強化和另一國的友好關係，讓敵對的國家因，自己結盟的關係，把另一國也跟著敵視自己的敵人，這就是一種「夥伴」的關係，在 1950 年代，中國採取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雖然「修正主義」學派的學者認為當時美國有和新建立的中國政權建立親善關係的機會，但是以當時的國際和國內環境而言，毛澤東其實並沒有在蘇聯和美國之間有自由選擇的餘地。因為美蘇的對立，蘇聯的慷慨援助，和中國新政權的意識型態和激進政策，北京在這種狀況之下，只可能站在蘇聯的一邊反對美國。結果中國和蘇聯結成了同盟，蘇聯是「老大哥」(senior partner)，中國則是「小老弟」(junior partner)。在華盛頓-莫斯科-北京的大戰略三角形當中，蘇聯和中國是夥伴，而美國是孤雛。這個「二負一正」的三角格局基本上是穩固的，因為除了內生因素之外，蘇聯和中國的夥伴關係與蘇聯與中國各自對美國的敵對態度都受到延伸關係的增強。另一方面，由於美國是蘇聯和中國的共同敵人，所以這會增強了莫斯科和北京方面的友好，再者中國佔據了和蘇聯一樣的夥伴關係，所以北京對華盛頓的敵對態度和對莫斯科的友好態度也是根據對任何一個延伸關係的增強而同時增強的。但是，在 1950 年代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衝突太大，所以華盛頓想擺脫孤雛的角色，卻因為美蘇兩極爭霸與意識型態的對立，雖就赫魯雪夫在一些政策上的反覆上，這些卻不能改變美蘇對立的基本格局；中國又和蘇聯是同盟關係，而且朝鮮半島上直接的武裝衝突，促使美國改變不了當時的現狀。到了 1950 年代末期，中蘇共之間的矛盾開始浮現。雙方的衝突包括北京發展核子武器的計畫、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的鞭屍、毛澤東的三面紅旗大躍進、中蘇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當中互爭高下，當赫魯雪夫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在 1959 年的大衛營會談後，毛澤東認為蘇聯老大哥背棄了國際共產主義的理想，和美帝國主義勾結，所以決定和莫斯科決裂，這時又開始了與第三世界交往的過程，因此中國雖然和美蘇之間變成三邊皆負的三角關係，卻由於這層外交作為之下，中國居然卻另外造就成一個以在第三世界為基礎上的，各對美或蘇產生一個小戰略三角形；在這樣的狀況下，中國的內部鬥爭提高了意識型態的地位，使得北京方面又是反蘇聯又是反美

國的「雙反」政策，但在美蘇兩極的敵對下，反而安然度過可能對任何一個國家造成的衝突。

我們或許認為戰略三角的型態可以引證中國實行大國外交的可行性，卻有部分的學者質疑，對當時的國際現勢而言，中國的實力遠低於美國及蘇聯兩個超強，中國最多只能算個區域強權，把中國與美蘇並列為世界三強來進行分析，引起許多現實主義學者的質疑。此外戰略三角研究途徑基本上主要是解釋中國對外關係的互動，對中國外交政策分析的解釋強度是不夠的。因此，戰略三角研究途徑雖然在 1970 年及 1980 年代盛行一時，卻未能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研究途徑的顯學。³²然就以這部分而言我們認為外交的政策必須是為了國家利益而服務的，在每個時期因應國際現勢而有不同的變化，這是戰略三角理論所察覺的演變，對當時國力的大小應有相對性的比較，而不是就此輕忽它。在 1968 年華沙公約國的軍隊在蘇聯率領下入侵捷克，強力鎮壓了「布拉格之春」，布里茲涅夫並且倡議社會主義國家的「有限主權論」，引起中國極大的疑懼，1969 年的珍寶島事件更造成中蘇共的武裝衝突，迫使北京全面備戰，在這種狀況下中國認定蘇聯是他的最大威脅，而美國是次要敵人。也因為文革的高潮已過，毛澤東可以用較現實的眼光來處理國際事務，也可印證出中國對於國際關係的應對和政策是很容易轉換的，而且是在國家利益的面前，「一邊倒」的政策還是可以對逐漸變成「聯美制蘇」，就單純的以意識型態或是國際體系等方法來研究，是不足以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做出一個明確的論述。所以，就以中國在建政初期乃至冷戰的最高峰期間，他不斷的運用各種的角度去對自己生存於國際間，一直修正外交的道路與政策，我們也可以說中國對於外交的底線是以「四個堅持」作為允許與各國間交往的條件，明白的說就是只要不影響到共產黨的利益之下，國家間的交往可以很靈活的執行。

在中國本身學界的文獻中，針對大陸學者高恆「中、美、俄大三角是世界戰略格局的核心結構；21 世紀這 20 年；中、美、俄大三角將對世界和平與穩定將起著決定性作用。中、美、日大三角是亞太地區戰略格局的核心結構；中、美、日都將尋求相互均勢；中、美、日大三角對亞太和平與穩定將起著決定性作用。……以總體上看，以美國「單

³²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外交關係，頁 15。

極」主張唯一方與中俄「多極」主張為另一方抗爭將貫穿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歷史進程，「多極化」的主張將會受到越來越多國家和人民的支持和歡迎。」³³的論述，明顯的揭出中國在面對冷戰後的國際格局之自我期許，其功能性，以及世界各國間的接受程度，也可以說是中國對於外交政策逐步演變中的一項要素，而中國也將這種外交模式，間接推展運用於維護其黨政利益，所以就回顧這些微的事件，中國是否能在大國外交的操作方式得到更大的黨政利益以及國家利益，這就是一種機會，但是如果因而造成對其黨的利益，或是世界各大國的抵制，則是本文所欲探究的事情。

³³高恆，**大國戰略**(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頁346。